

恐怖主义动荡弧：基于体系视角的解读*

王涛 鲍家政

内容提要 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不仅可以从组织、观念层面入手，而且需从体系层面进行解读。作为体系的恐怖主义动荡弧，是基于组成体系各单元及其互动关系形成的。这些单元包括全球性恐怖组织、区域性恐怖组织、“独狼”。其互动类型涉及竞争、合作、联盟，互动内容包含人员、资金往来，以及观念的分享。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在形成后具备一种整体性特征，核心表现是“反馈”效应。其中，正反馈推动体系的变化和发展，负反馈保证了体系的稳定。从体系格局上看，恐怖主义动荡弧是不稳定的，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单极→两极→单极”的快速嬗变。从体系机制上看，尽管缺乏明确的法律、条约规定，但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已出现了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与内在奖惩机制。从体系文化上看，恐怖主义动荡弧已形成一套将外部信息扭曲化处理并加以自我形塑的封闭性文化场域。这类信息会固化内部成员的认知模式与过程，内化他们的恐怖身份，最终使其成为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坚实维护者。针对该体系，国际社会在反恐过程中，既要对该体系进行系统的综合打击，也要切断外部世界对动荡弧体系的支持，方可从根本上破解恐怖主义痼疾。

关键词 恐怖主义动荡弧 单元互动 体系属性 整合性治理

作者简介 王涛，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副教授（昆明 650091）；鲍家政，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硕士生（昆明 650091）。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ADZ096）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同时，笔者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刘中民教授针对本文提出的细致的建设性意见。

超越组织与观念：问题的提出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与反恐成为国际安全的核心议题之一。目前，尽管反恐战争已旷日持久，反恐策略也日益完善，但国际恐怖主义在高压打击下仍演化出复杂多样的组织形态，其影响范围也不断扩大，甚至出现了一条从西非萨赫勒、经中东到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动荡弧”（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为何在兼用有形的组织打击与无形的反恐怖主义叙事建构之后，恐怖主义依然猖獗？且呈现出“越反越恐”之势？甚至于对一些恐怖组织的消灭反倒催生出更多改名换姓的新恐怖组织？这无疑反映出人们对恐怖主义的体系认知缺陷，以及由美国所主导的反恐机制与实践缺陷。

在恐怖主义“越反越恐”现象的背后，是否存在着意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之外的、被忽视了的恐怖主义维度？刘中民归纳了“反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伊斯兰例外论”“伊斯兰威胁论”，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论”等5种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与国际体系关系认知的研究。他认为，极端组织对“圣战”内涵的扭曲和滥用反映了伊斯兰因素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影响。^①然而，正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等人所强调的，诸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得“伊斯兰”和“阿拉伯”这类跨国认同弱化，而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矛盾在中东政治与国际关系领域释放出更大的影响。^②这类冲突超越了该地区的民族、宗教认同，使伊斯兰世界难以被视作一个整体或体系。而对于各类恐怖主义行为体而言，其属性的相似性、战略诉求的共通性等特征都使其更易于整合为一个系统。的确，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恐怖主义整体性、联系性的性质。内森·哈米尔特（Nathan Brant Hamilt）就注意到，恐怖组织分权化结构所带来的分散性问题，即某一恐怖组织被击溃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而预示了新一轮的分化、重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恐怖主义在地理上

^① 刘中民：《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传统理念、当代体现及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5期，第6~8页。

^② [英国]巴里·布赞、[丹麦]奥利·维夫、[荷兰]迪·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180页。

的扩散。^① 迈克尔·霍洛维茨 (Michael C. Horowitz) 和菲利普·波特 (Philip B. K. Potter) 指出, 当今恐怖组织已非孤立的存在, 而是在一套联系紧密的关系网络中活动, 这种网络具有反对现有国际体系的联盟性质。^② 欧朝敏、姜鹏也注意到了恐怖组织的跨国性和相互关联性等特点。^③ 李伟在他的著述中使用“国际恐怖主义生态”一词,^④ 也已隐含了对恐怖主义系统性和体系性的认知。事实上, 恐怖主义已不仅仅是现有国际体系内的一股破坏性力量, 它更发展、演变、凝聚出了恐怖主义动荡弧, 并具备了体系结构的特征。^⑤ 正如华尔兹对体系结构作用的重视——结构不仅通过自身的规则形塑内部单元的行为模式, 而且在结构内的竞争也会调节单元间的秩序。总之, 体系结构对单元具有决定性作用。^⑥ 我们若不能从这一视角对其进行审视, 便无法针对其中的单元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⑦ 这或许也揭示出, 正是由于动荡弧体系的存在及国际社会对它的忽视, 使得国际社会以恐怖组织 (即单元) 为目标的反恐努力无效。

若从体系这一视角来审视动荡弧我们就会发现, 长期以来, 有关恐怖主义动荡弧的解读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尽管“九·一一”事件一发生, 美国国防部智库就敏锐地将动荡弧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⑧ 这种关联随之引起学界的争论, 即围绕动荡弧形成了“现象说”与“观念说”。“现象说”主张动

① Nathan Brant Hamilt and David H. Gray, “Decentralized Terrorism: Ramifications for a Centralized International System”,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2, 2012, pp. 24-26.

② Michael C. Horowitz and Philip B. K. Potter, “Terrorist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for Lethalit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8, No. 2, 2014, pp. 199-200.

③ 欧朝敏、谭跃进:《九一一事件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发展动态——基于 ARMA 干预模型的分析》,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2期, 第132~133页;姜鹏:《伊斯兰世界U型认同与恐怖组织类型关联性研究》,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1期, 第132页。

④ 李伟:《“伊斯兰国”溃败对国际恐怖主义生态的影响》,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8期, 第44~45页。

⑤ 若以李少军对体系结构三要素——“体系”“单元”“互动”的界定为标准, 那么恐怖主义动荡弧已具备一种体系结构的特点。参见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第126页。

⑥ [美国]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77~82页。

⑦ 朱永彪曾探讨了当前国际社会结构压力会对恐怖组织的策略选择产生的影响。参见朱永彪、武兵科:《结构压力、资源动员与极端组织的攻击策略》,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第97~99页。但此文未注意到恐怖主义自身体系结构的存在及影响。

⑧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f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30, 2001, p. 4.

荡弧乃是恐怖主义产生与活动的前提或后果。具体而言，约纳·亚历山大（Yonah Alexander）等人认为，动荡弧是恐怖组织的活动场所；^①其中，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布莱恩·罗赛（Brian L. Losey）和克莱尔·米特利茨（Claire Metelits）明确把动荡弧与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活动区域联系起来。^②与之不同的是，萨义德·布哈里（Syed Adnan Ali Shah Bukhari）等人认为动荡弧是恐怖组织活动造成的后果；^③詹妮弗·库克（Jennifer G. Cooke）等人则将动荡弧视为恐怖组织影响下的安全脆弱带；^④阿卜杜拉耶·迪耶（Abdoulaye Mar Dieye）等更是明确将滋生恐怖主义的国家或地区称为动荡弧。^⑤

而持“观念说”的学者则认为，动荡弧是美国出于战略需求而建构出的一个本不存在的概念。埃贾兹·海德尔（Ejaz Haider）的研究表明，动荡弧是一个用于标识那些与美式民主相背离的、国内恐怖主义横行国家的标签。^⑥雅希亚·祖拜尔（Yahia H. Zoubir）曾明确指出，恐怖主义动荡弧的提出只是为美国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依据。^⑦金炳国（Byung - Kook Kim）也认为

① Security Council, “‘Arc of Instability’ across Africa, If Left Unchecked, Could Turn Continent into Launch Pad for Larger - Scale Terrorist Attacks, Security Council Told”, United Nations, May 13, 2013, <https://www.un.org/press/en/2013/sc11004.doc.htm> 2018 - 10 - 12; Yonah Alexander, *Terrorism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in 2013*, Arlington: Inter - University Center for Terrorism Studies, January 2014, pp. 4 - 5; Ufem Maurice Ogbonnaya, “Terrorism, Agenda 2063 and the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2, p. 189.

② John Russell, “The Geopolitics of Terrorism: Russia’s Conflict with Islamic Extremism”,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0, No. 2, 2009, p. 185; Brian L. Losey, “Conflict Prevention in East Africa: The Indirect Approach”, *PRISM*, Vol. 2, No. 2, 2011, p. 81; Claire Metelits, “Challenging U. S. Security Assessments of Africa”, *African Security*, Vol. 9, No. 2, 2016, p. 96.

③ Syed Adnan Ali Shah Bukhari and Sadia Sulaiman, “The Swat Conflict: An Arc of Instability Spreading from Afghanistan to Central Asia and Xinjiang”, *Terrorism Monitor*, Vol. 7, No. 13, 2009, pp. 8 - 10; J. Peter Pham, “Perilous Desert: Insecurity in the Sahara edited by Fredric Wehrey and Anouar Boukhars”,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 51, No. 1, 2014, pp. 83 - 84.

④ Jennifer G. Cooke and Thomas M. Sanderson, *Militancy and the Arc of Instability: Violent Extremism in the Sahel*, Lanham: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6, pp. 1 - 3, 15 - 28.

⑤ Abdoulaye Mar Dieye, *Current Threats in Nigeria, the Great Lake Region, Mali, Somalia and East Africa;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pons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Instability in Africa, May 2016, p. 2.

⑥ Ejaz Haider, “Arc of Instability”, *The World Today*, Vol. 59, No. 8/9, 2013, p. 25.

⑦ Yahia H. Zoubir,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ghreb - Sahe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 5, September 2009, p. 992.

恐怖主义动荡弧是美国进行反恐战争并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的借口。^① 尼克·图尔斯 (Nick Turse) 更是直接指明, 恐怖主义动荡弧完全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造的概念。他指出, 小布什政府时期, 这一概念服务于美国能源安全战略, “动荡弧”所涉及的国家往往都是产油国; 在奥巴马政府当政时期, 这一概念则与传播美式民主相联系, 是美国“诬陷”与其价值观相左国家的手段。^② 高祖贵则认为恐怖主义动荡弧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美国确保现实利益、谋取有利战略态势、制约其他战略力量的一种方式。^③

由此, “恐怖主义动荡弧”这个概念本身就带有美国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观念的深刻烙印, 是一种非友即敌、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元对立观的产物。然而, 这个概念确实也指明了某些真实现象, 并提炼出“恐怖主义”与“动荡”两个现象属性。在没有更好地用以概括这一现象的新概念出现前, “恐怖主义动荡弧”仅作为一个工具性概念依然是有用的。但是, 上述对“恐怖主义动荡弧”的“现象说”与“观念说”的解读, 均未能触及其实质性的体系特征。^④ 作为一种体系, 恐怖主义动荡弧是指21世纪以来随着恐怖主义在亚非等地的蔓延而形成的一条从西非萨赫勒地带到中亚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在地理上相互联通、在人员物资上相互流动、在观念上相互共振、在行动上相互呼应的政治不稳定与安全脆弱地带。在这一地带内, 由于恐怖主义的深刻影响, 已形成与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差异巨大的、以反世俗、反现代、反国家主权为特征的一种对抗性体系。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 首先提炼恐怖主义组织等可能作为体系单元的要素, 并呈现这些单元的互动。单元及其互动正是一个体系产生的必要前提与有机

① Byung-Kook Kim, “Between China, America, and North Korea: South Korea’s Hedging”, in Robert S. Ross and Zhu Feng eds.,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99.

② Nick Turse, *The Changing Face of Empire: Special Ops, Drones, Spies, Proxy Fighters, Secret Bases, and Cyberwarfare*,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2, pp. 79-80.

③ 高祖贵:《美国在“动荡弧”的战略利益分析》, 载《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第82页。

④ 不过, 2015年以来, 约纳·亚历山大不再单纯将恐怖主义动荡弧视为恐怖组织的活动场所, 进一步发展出动荡弧是恐怖主义跨国网络的观点。孙德刚也意识到, 全球圣战网络正发展为“动荡弧”, 已具有将动荡弧视为一种结构的意识, 但并未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See Yonah Alexander, *Terrorism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in 2014*, Arlington: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Terrorism Studies, 2015, p. 3; Yonah Alexander, *Terrorism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Sahel in 2016*, Arlington: Inter-University Center for Terrorism Studies, March 2017, p. 7; Degang Sun, “China and the Global Jihad Network”, *The Journal of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Vol. 1, No. 2, 2010, p. 196.

组成。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超越单元及其互动、同时又对单元及其互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动荡弧体系的格局、机制与文化特征，进而从作为自变量的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与作为因变量的恐怖组织的角度，挖掘破解恐怖主义“越反越恐”难题的新思路。

单元及其互动：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形成

从体系的视角出发，恐怖主义动荡弧由诸多单元组成，其内部单元之间的一系列竞争、合作、联盟等互动塑造出以反西方为旗号、以颠覆现行国际体系为本质的结构特征。随着恐怖主义动荡弧的形成，它对其中单元的身份属性、行为方式，单元间的等级结构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恐怖主义动荡弧会对其内部单元的行为起到一种“选择器”（Selector）的作用。所谓“选择器”，指的是行为体会通过其以往行为所受到的奖励或惩罚来决定其之后的行动方向。^① 动荡弧的体系结构会凝聚内部单元的无形共识，并通过鼓励性或惩罚性手段规范内部单元的行为，塑造出思想极端化、手段恐怖化的偏好。正是这类偏好的出现，使得恐怖主义动荡弧的“稳定器”（Stabilizer）发挥作用。所谓“稳定器”是指体系形成后将内部各单元的行为控制在一个不危及体系稳定的区间内，并能有效应对外界变量的干扰。^② 内部特性相似的单元将构成同质型系统（Homogeneous Systems），这种系统具有稳定性。^③ 正是基于此，在动荡弧形成后，无论其内部单元如何分化、重组、变异，或受到怎样的外部冲击，但各单元的行动方式与结果仍是趋同的。

① 华尔兹认为结构通过奖励某些行为，同时对某些行为进行惩罚来进行选择。参见 [美国] 肯尼思·华尔兹：前引书，第 77～78 页。

② 华尔兹认为，结构可以将结果控制在一个狭小范围内。参见 [美国] 肯尼思·华尔兹：前引书，第 77 页。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布莱恩·巴里（Brian Barry）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体系具有“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或“自我平衡”（Homeostatic）的能力。See Karl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 315 - 317; Brian Barry, *Sociologists, Economists and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169 - 170.

③ [法国]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国际关系理论》，朱孔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96 页；Stanley Hoffman,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Klaus Knorr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207 - 209.

（一）组成单元

恐怖主义动荡弧中的单元主要包括全球性恐怖组织、区域性恐怖组织和恐怖化的个人三类。第一类是全球性恐怖组织。它们的组织实力较强，可以制造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甚至可以对一些弱小国家的政府“宣战”；强大的实力使它们的活动范围经常是跨地区的，影响往往辐射全球。这类组织的典型就是“基地”组织（al-Qaeda）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① 第二类是区域性恐怖组织。与全球性恐怖组织相比，它们的组织实力相对弱一些，活动范围多局限于一国境内的偏远地区或两国（多国）交界处的政府管控真空区内。由于受到产生环境的影响，它们的组织诉求也更为多元，除了“全球圣战”外，还追求割据建国、族群整合等目标，如妄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以及试图将分布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的索马里人整合成一个“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b）。^② 第三类是恐怖化的个人，即“独狼”（Lone Wolf）。他们与各类恐怖组织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受到后者的宣传蛊惑而成为独自采取行动的恐怖主义者。^③ 例如2013年4月波士顿爆炸案的制造者焦哈尔·察尔纳耶夫（Dzhokhar Tsarnaev），以及2015年1月《查理周刊》袭击事件的制造者赛伊德·库阿希（Said Kouachi）、谢里夫·库阿希（Cherif Kouachi）、哈伊德·穆哈德（Hamyd Mourad）。这些人尽管力量不大、可持续性不强，但由于其所具有的隐蔽性、流动性强等较为灵活的特点，以及对能造成大面积恐慌的自杀式手段的青睐，因此他们制造的恐怖袭击的危害也不容小觑。^④

在恐怖主义动荡弧中，这三类单元由于实力、影响力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权力基础。其中，组织发展程度、人员数量、资金情况、武器装备水平等硬实力，与意识形态吸引力、组织声誉等软实力，都是影响权力基础的重要因素。“基地”组织、“伊斯兰国”除组织发展较为成熟、人员数量多且战斗力较强、资金较充裕，且装备较先进外，它们还主导着“全球圣战”的阐

① 周明、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1页。

②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71页。

③ George Michael, *Lone Wolf Terror and the Rise of Leaderless Resistance*,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

④ 钱雪梅：《基地的“进化”：重新审视当代恐怖主义威胁》，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第133~134页。

释权和对其他组织的评判权，因而综合实力较强的这两个组织就在恐怖主义动荡弧内拥有较强的权力基础。尽管博科圣地（Boko Haram）、索马里青年党等组织也曾通过制造大规模袭击、绑架事件以扩大“知名度”，但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均不及“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且需要后者经常提供人力与物资支持。虽然这些组织也拥有全球性的“组织声誉”，但它们的活动仍主要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内部，它们的权力基础也相对薄弱。而诸如西非萨赫勒地区的“信仰捍卫者”（Ansar Dine）、“麦基纳解放阵线”（Macina Liberation Front）、尼日利亚的“安萨鲁”（Ansaru）、印尼的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等另一些区域性恐怖组织，由于受限于所掌握的资源，它们不仅活动区域较为局限，而且在组织“知名度”上也不及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权力基础就要更为薄弱一些。^① 这些区域性恐怖组织为了在恐怖主义动荡弧内取得更多的发展资源并获得较为有利的地位，就会在名义上依附于全球性恐怖组织，甚至在某些时候还会“让渡”某些组织的权力。^②

表1 恐怖主义动荡弧内各单元的情况比较

类型	动机	架构	可持续性	行动方式	活动范围	目标敌人	影响
全球性恐怖组织	集中	完备	强	多元	全球、有渗透性	明确	大
具有全球影响的区域性恐怖组织	多元	完备	较强	多元	区域	明确	较大
区域性恐怖组织	多元	较完备	一般	多元	区域	明确	一般
恐怖化个人	多元	无	弱	单一 (自杀式袭击)	随机	不明确	随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有关“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等相关资料及其他网络报道自制。

^①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2~113页。

^② 曾向红、梁晨：《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结构的演化》，载《中东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第56~57页。

有些学者认为某些支持恐怖组织或放任恐怖组织在其境内活动的国家，也是恐怖主义动荡弧的组成部分。^①但实际上，恐怖主义动荡弧这种体系结构并不能对受其影响的国家行为体实现行为规范的重塑，相关国家的主要行为仍受制于全球性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有国际体系；同时，这些国家行为体的观念与行动也未参与塑造动荡弧的体系结构。因此，相关的国家行为体仅能被视为恐怖主义动荡弧内各类单元的载体，即某些国家会为恐怖组织的滋生、发展等提供条件。例如，对于叙利亚、索马里等政府治理能力较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共同特征往往是政府能力缺位，社会失序，各类矛盾激化，甚至内战长期持续。^②这类国家不仅无力阻止恐怖组织的产生与发展，还会为后者提供人力、活动空间等资源，^③甚至其固有的法理主权（Juridical Sovereignty）对于活动其中的恐怖组织还起到了一种“保护伞”的作用，掣肘着外部力量的干预。

（二）互动类型

单元间互动是指行为体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带有一定利益目标的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④各类恐怖组织间、恐怖组织与“独狼”间、不同“独狼”之间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性，会产生竞争、合作、联盟等形式的互动。其中，由于“独狼”活动的间歇性——无论自杀式袭击是否成功，它们对动荡弧体系结构的影响都相对较小；而恐怖组织间的互动对于动荡弧体系结构特征的形成与稳定则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竞争型互动是指两个或多个恐怖组织围绕相同或相似目标而展开博弈的行为。当一种资源能帮助其拥有者保有并获得更多其他资源时，该资源就具有累积性（Cumulative）特征。^⑤争夺累积性资源则是行为体发生竞争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对于恐怖组织而言，这种累积性资源既包含资金、人员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无形资源。资金、人员、装备等有形资

① Abdoulaye Mar Dieye, *op. cit.*, p. 2.

② Peter Ekeh, “Colonialism and the Two Publics in Africa: A Theoretical Statement”,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17, No. 1, 1975, pp. 91 - 112.

③ 贾春阳：《当前中东“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0期，第25页。

④ 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2页。

⑤ Robert A.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7.

源的累积将会增加恐怖组织的权力，它们会利用这种权力继续保有、扩大对更多有形资源的控制。在一定时间内，有形资源还表现为一种“减少型价值”，尤其是在外部“反恐”压力对恐怖组织所掌握资源进行打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围绕有形资源的占有和分配，各恐怖组织间必然会出现竞争乃至对抗与冲突。不仅“伊斯兰国”在兴起后与“基地”组织争夺各类有形资源，而且“基地”组织也会与其他一些区域性恐怖组织围绕各种资源展开竞争。例如，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独立性的增强，“基地”组织为了牵制前者的行动并分化其内部成员，又专门成立了“基地”组织北非分支。^①作为一种无形的累积性资源，它对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掌握则关系到恐怖组织自我身份的建构乃至行为的合法性程度等问题。而其他恐怖组织对这种身份“正统性”与行为合法性的判定，也就成为某一恐怖组织能否树立自身“声誉”，能否有效吸引外部人员、物资支持，能否有效拓展组织外部关系网络的重要前提，更决定了该组织在动荡弧中的位置与地位。^②其中，对于活动区域重合度较高，或具体政治诉求较为相似的恐怖组织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将直接影响组织成员的去留问题。索马里的伊斯兰党（Hizbul Islam）就曾面临着与同一区域的青年党的竞争，后者的崛起曾一度吸引了大批伊斯兰党成员叛离原组织。而为了组织的存续及保持对外吸引力，伊斯兰党也经常就“何为泛索马里主义、如何实现泛索马里主义”等问题同青年党展开论争。与之相对，在“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这类全球性恐怖组织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往往表现为对“全球圣战”领导权、阐释权的争夺，是一种零和博弈。^③

合作性互动是指两个或多个恐怖组织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采取的联合或协调性行为。当行为体将其行为调整到与其他行为体实际或预期偏好一致时，合作就会发生。恐怖组织间的合作同样也是彼此行动或目标相互妥协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们之间的合作主要有以下3种：一是基于观念的合作。观念结构与叙述模式的相似性会促进恐怖组织间的相互认同，这种认同是合作产生

① 王涛、曹峰毓：《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特点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89页。

② 李捷、杨恕：《“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叙事结构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12期，第11~18页；周明、曾向红：前引文，第80~111页。

③ Daveed Gartenstein-Ross, Jason Fritz, Bridget Moreng and Nathaniel Barr, *Islamic State VS. Al-Qaeda: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a Patricidal conflict*,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2015, p. 3.

的基本前提。^①对圣战萨拉菲主义（Jihadist Salafism）的信奉、对“全球圣战”理念的鼓吹增强了恐怖组织间的相互认同。例如，原本更多依赖泛索马里主义而组建的青年党，2011年以来逐渐偏向“全球圣战”，从而与“基地”组织“共享”一套观念，创造了与“基地”组织合作的前提。^②而致力于推翻现政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也在接受圣战萨拉菲主义理念后开始与“伊斯兰国”建立合作关系。^③二是基于利益的合作。利益结构与诉求的相似性同样也是行为体间进行合作的重要出发点。^④就恐怖组织而言，基于利益的合作往往是出于自身发展的考量，是策略性的。^⑤尽管“博科圣地”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政治诉求各异且活动地域相距遥远，但在2011~2012年间，二者为了获取资金便协同在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共同实施了多起绑架与勒索赎金的行动。^⑥虽然“基地”组织曾指责这种勒索有违“圣战”精神，而主张代之以“斩首”，但“博科圣地”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经济需求压倒了观念性规则，并成为二者开展合作的重要基础。^⑦三是外部压力倒逼的合作。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迫使恐怖组织为了共同的生存目标而在情报、行动等领域开展合作，这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恐怖主义动荡弧的整体利益。在叙利亚，虽然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和“伊斯兰国”在控制石油资源和划分势力范围上存在尖锐斗争，但随着俄罗斯与叙利亚政府军所施加的日益增大的军事压力，二者反而实现了情报共享并协同行动，以缓解外部压力。^⑧同样，随着“伊斯兰国”主体被

① Daveed Gartenstein-Ross, Nathaniel Barr and Bridget Moreng, *The Islamic State's Global Propaganda Strategy*, Hagu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 Terrorism, 2016, p. 4.

② 王涛、赵跃晨：《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世界民族》2018年第4期，第50~51页。

③ Hekmatullah Azamy, "Will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 Trade the Taliban for ISIS",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7, No. 6, 2015, p. 30.

④ 王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国际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8期，第12~13页。

⑤ 曾向红、陈亚洲：《恐怖主义的组织结构：类型辨析及其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第101~102页。

⑥ Raffaello Pantucci and Sasha Jespersen, *From Boko Haram to Ansaru: The Evolution of Nigerian Jihad*, London: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April 2015, p. 27.

⑦ Jacob Zenn, "Demystifying al-Qaida in Nigeria Cases from Boko Haram's Founding, Launch of Jihad and Suicide Bombings",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 Vol. 11, No. 6, 2017, pp. 177-178.

⑧ Meah Mostafiz, *Syrian Conflict,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in Peaceful Settlement*, Stadtschlaining: European Peace University, July 2013, pp. 4-6.

击溃，它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也可能由于国际社会的高压而寻求与“基地”组织的重新合作。

联盟性互动是指某个恐怖组织通过让渡或在名义上让渡组织的某些权力给另一恐怖组织而实现的结盟行为。对于联盟的主导方来说，联盟的建立首先可以通过扩展“下属”组织而实现生存空间的拓展；其次，联盟还可以增强主导方的合法性与影响力；再次，联盟将有助于主导方与其他恐怖组织竞争者的对抗。^① 联盟还将为主导方带来一定的衍生收益，如意识形态输出、人员资金流动等。对于联盟的附属方而言，与强大组织的联盟将更容易得到资金、物资、甚至人员补充。这种力量的壮大也能使其在与政府等的博弈中获得更多筹码。长远来看，通过结盟也能强化附属一方的组织能力，并增强其组织声誉。2007年，“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Salafist Group for Preaching and Combat）出于壮大实力、增强影响的考量而与“基地”组织结盟，并改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基地”组织借此也拓展了在北非乃至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影响力。^② 同样，“博科圣地”于2015年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改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Islamic State’s West Africa Province），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对于“伊斯兰国”来说，接纳影响力较大且“雄霸”乍得湖流域的“博科圣地”入盟有助于瓦解“基地”组织的全球网络，并提高自身的“全球声誉”。^③

值得注意的是，恐怖组织间的联盟具有高度不稳定的特征。一方面，恐怖组织由于缺乏“主权”“边界”等内在要素，使得它们之间的结盟有可能演变为同化或被同化的过程，主导方常会通过派遣人员“指导”附属方的工作，对后者进行“收编”。^④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的反恐压力也使恐怖组织间的联盟更多停留在相互声援的阶段，即一种名义上的结盟，缺乏实质性内涵。而在权利、义务都缺失的情况下，附属组织往往会选择趋利避害、左右逢源。

① 参见 [美国] 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高婉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② Ricardo René Larémont, “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the Sahel”, *Africa Security*, Vol. 4, No. 4, 2011, pp. 242-245.

③ Harleen Gambhir, *ISIS Global Intelligence Summary*, Washington D. C.: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 May 2015, pp. 2-9.

④ Alexander Thurston, *Boko Haram: The History of an African Jihadist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76.

在“伊斯兰国”崛起之际，“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领导层就试图与其建立合作关系，但又不公然打破与“基地”组织的联盟关系。^①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的联盟仅是名义上的。

（三）互动表现

单元间互动是否影响到单元的决策乃是体系是否形成的标准。对于恐怖主义动荡弧这种体系结构而言，内部单元的互动不仅表现为人员、资金等物质要素的流动，更会在单元间观念的互通与共识的培育上体现出来，后者塑造了恐怖主义动荡弧的体系规则。

作为互动基础的人员流动主要有3种情况：其一，将组织成员派至另一组织接受培训。通过传染（Contagion）与扩散（Diffusion）机制，恐怖组织变得既有模仿性（Imitative）又有创新性（Innovative）。^②例如，“博科圣地”不仅派其骨干成员易卜拉欣·哈伦（Ibrahim Harun）等人前往“基地”组织接受全面训练，也曾派出超过100名成员在马里加奥地区（Gao）接受“西非统一圣战运动”（MUJAO）的培训。^③其二，派遣组织成员为另一组织提供“指导”。与恐怖组织间单纯的意识形态输出相比，人员输出产生的影响将更为重要。例如，“基地”组织曾派驻索马里青年党的萨利赫·阿里·萨利赫·纳卜汗（Saleh Ali Saleh Nabahn），成为索马里青年党实施恐怖袭击破坏性活动的重要推手。三是组织的分化重组。恐怖组织间最大程度的人员互动表现为某一组织在遭遇生存困境后的集体、大规模转移。例如“伊斯兰国”2017年以来在叙利亚难以立足，组织成员逐渐向北非、中亚、南亚乃至东南亚地区转移。这种转移是以“伊斯兰国”成员加入其分支的形式完成的。以阿富汗为例，2017年初，“伊斯兰国”在其阿富汗分支的成员仅有700余名，2018年初则迅速膨胀到数千人。^④

资金作为互动的保障，是恐怖组织重要的操作工具；资金的输出可以影

① Manni Crone, “Islamic State’s Incursion into North Africa and Sahel A Threat to al - Qaeda?”, *Connections*, Vol. 16, No. 1, 2017, p. 69.

② Paul Gill, John Horgan, Samuel T. Hunter and Lily D. Cushenbery, “Malevolent Creativity i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Vol. 47, No. 2, 2013, p. 125.

③ Hussein Solomo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Africa: Fighting Insurgency from Al - Shabaab, Ansar Dine and Boko Hara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76, 88.

④ Amanda Erickson, “How the Islamic State Got a Foothold in Afghanista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1,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21/how-the-islamic-state-got-a-foothold-in-afghanistan/?utm_term=.009c41cb933, 2018-06-18.

响其他组织的政治偏好并有助于加强组织间联系。^① 对全球性恐怖组织而言，资金还是其运营分支、维系与附属组织关系的重要手段。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后凭借丰厚的资金吸引了一批“基地”组织原分支及其伙伴组织的效忠与合作，而随着它从2017年以来的逐渐式微，“基地”组织又开始重新拉拢这些曾倒向“伊斯兰国”的组织，如萨赫勒地区的“守护者”（al - Mourabitoun）。^②

恐怖组织间的互动会引发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和框架扩大（Frame Amplification）的过程。框架桥接指恐怖组织间通过人员流动、资金转移、组织拓展、信息传播等互动所引发的“公众偏好集群”效应（public opinion preference clusters）。^③ 这种集群效应的表现包括：其一，各恐怖组织都逐渐感受到它们在反主流政治文化上的相似性，并“树立”了共同的“政治对手”；其二，各恐怖组织认识到生存目标的一致性——防御和反镇压、宣传并扩大势力；其三，各恐怖组织行动策略的趋同性——极端化、暴力化、恐怖化。框架桥接为恐怖组织创造了交集，以此为基本前提，进而发展出框架扩大的过程。

所谓框架扩大，指的是一种自我解释、合理化及效用激活的过程。恐怖组织无论是生存还是行动或认知，都需要建立合理化的解释框架，从而赋予其意义。恐怖组织经过认知重建（Cognitive Amplification）的工作，将外界视为极端、残忍、罪恶、应受谴责的恐怖主义实践，改造重建为在他们看来高尚、奉献、具有终极意义的行动。^④ 恐怖组织还将暴力实践融入其宗教的“宏大叙事”之中，达到了远比对暴力的简单辩护更具说服力的效果。

具体而言，框架扩大可进一步细分为价值扩大（Value Amplification）与

^① Kim Cragin and Sara A. Daly, *The Dynamic Terrorist Threat: An Assessment of Group Motivations and Capabili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4, pp. 54 - 57.

^② Jason Burke, "Al - Qaida Moves into Recruit From Islamic State and Its Affiliates", *The Guardian*, January 19,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jan/19/al-qaida-recruit-from-islamic-state-affiliates-isis>, 2018 - 04 - 18.

^③ David A. Snow,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7 - 469.

^④ Martha Crenshaw, "Decisions to Use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on Instrumental Reasoning",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ed., *Social Movement and Violence: Participation in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s*, Greenwich: JAI Press, 1992, pp. 29 - 42.

信仰扩大 (Belief Amplification)。^① 价值扩大指的是各类恐怖组织在互动中增进了对彼此价值观的理解, 进而形成认同感, 最终融汇为内涵扩大或升华的新价值观。无论是跨界族群主义、族群分离主义还是反世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都通过恐怖组织的互动而被置于对“乌玛”的追求这一宏大价值体系之中。^② 信仰扩大指的则是恐怖组织在追求上述价值过程中赖以支撑自身行动的相关实践论的拓展。如何解读恐怖组织成员的自杀性袭击? 它首先是物质激励的结果, 其次也是成员对恐怖组织的最高效忠表现。^③ 然而, 经由恐怖组织的互动及相互学习, 这种行为也被上升至“殉道”的高度。故此, 在恐怖组织的话语体系中, 对组织的忠诚仅是形而下的实用信仰, 其背后蕴含着对“认主独一”的坚守、对异教徒的零容忍及随之而来的“净化”这套形而上的宗教指导。至此, 恐怖组织间形成了互通的意识形态, 并使恐怖主义动荡弧最终具备了体系结构的诸多特征。

综上所述, 排除了“独狼”的其他各恐怖主义单元, 基于各自不同的身份属性与影响, 通过竞争型、合作性、联盟性互动, 实现了人员、资金、观念等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尤为重要的是, 这种作用的效应不仅存在于当前, 更是一种预期性的和具有结构约束力的, 因而具备了超越单元及其简单互动的深层次后果。实际上, 各单元最终熔于一个内在规则一致、外部身份边界清晰的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之中。基于此, 我们有必要详细论述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超越于单元及其互动的新的内涵与新特点。

格局、机制与文化: 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属性

体系在形成之后将具备一种整体性, 这种整体性具有不同于各部分的运行方式,^④ 其核心表现就是“反馈”效应 (Feedback)。“反馈”分为两种,

^① David A. Snow, E. Burke R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9-472.

^② 刘中民: 前引文, 第 4 页。

^③ Burcu Pinar Alakoc, “Competing to Kil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Versus Lone Wolf Terrorist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9, No. 3, 2017, p. 516.

^④ Robert Jervis, “Systems Theories and Diplomatic History”, in Paul Gordon Lauren ed.,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 212.

如果某一趋势的变化所导致的压力增强，进而引发该趋势的进一步发展，该反馈就是正向的、不稳定的；若变化激发的作用力抵消了最初趋势的变化，将结构状态推回到趋势变化之前，该反馈就是负向的、稳定的。简言之，正反馈推动体系的变化和发展，负反馈则保证了体系的稳定。^① 具体到恐怖主义动荡弧，在“伊斯兰国”崛起前，动荡弧内的各类单元活动主要以恐怖袭击等不对称策略为主；在其崛起后，不仅在架构叙事上与“基地”组织竞争，^② 还发展出了运动战和控制领土等新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正反馈。然而，“伊斯兰国”的这类策略不仅遭到了“基地”组织等的对抗，其攻城略地的做法也引发更大的外部反弹，这种负反馈的发生使恐怖主义动荡弧回归此前以网状架构为特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初步认为，产生反馈效应的恐怖主义动荡弧已显现出整体性的特征，并具备了其内部单元在互动中所无法单独呈现出的新特点。

第一，从体系格局上看，恐怖主义动荡弧是不稳定的，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了“单极→两极→单极”的快速嬗变。从1986年“基地”组织成立到1996年亚非地区诸恐怖组织与“基地”组织普遍建立联系起，恐怖主义动荡弧的单极格局开始初步显现。^③ 其中，“基地”组织作为动荡弧体系中的“极”，致力于将自身影响力投射到其他恐怖组织，以构建一个横跨西非、北非、西亚、中亚、南亚，直到东南亚的“系统体系”（system of systems）。^④ 各地区的恐怖组织在地理上呈点状分布，“基地”组织通过与它们的互动将各个“点”连缀为一个网络，^⑤ 在权力分配上则根据与“基地”组织的亲疏关系形成一个同心圆层级结构，“基地”组织的分支组织及一些与“基地”组织联络较密切的恐怖组织是围绕“基地”组织的内层，它们在人员、资金、

① [美国] 罗伯特·杰维斯：《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李少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② 周明、曾向红：前引文，第80~111页。

③ 1996年，本·拉登发布了第一份警告美国撤出阿拉伯半岛、否则将对美“宣战”的“巴彦”（公开宣言）。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几乎同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2000年又在也门对美国“科尔号”军舰发动了袭击，它们最终被认定是“基地”组织协同东非与也门本地恐怖分子所为，表明恐怖组织已出现了广泛联系的特征。参见[美国]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斯：《中东史》，哈全安、刘志华译，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57页。

④ Martin Rudner, “Al Qaeda’s Twenty-Year Strategic Plan: The Current Phase of Global Terror”,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6, No. 12, 2013, p. 956.

⑤ Joshua Kilberg, *Organizing for Destruction: How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ffects Terrorist Group Behaviour*,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Norman Pater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p. 37.

行动策略等方面都受到“基地”组织较多的影响。^①其他区域性恐怖组织则构成权力的外层，它们与“基地”组织联系不多，有时甚至可能只是对宣传话语的借用，或是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行事。在该体系中，“基地”组织尽管通过人员派遣、资金输出，以及对“示范性行为”的塑造，掌握着体系运转的最高主导权；但受限于“基地”组织自身的实力，其他恐怖组织在行动目标、策略，人员构成与资金来源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

这种松散的体系结构一方面具备包容性，可以将与“基地”组织理念有所差异的恐怖组织吸纳其中，甚至令其成为“基地”组织在某一地区的分支；但另一方面，它也蕴含了突破“单极”格局的可能性。2014年，曾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l-Qaeda in Iraq）的“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理念与行动策略上分道扬镳。前者通过建立“哈里发国家”与“基地”组织展开了全面竞争，^②践行一种“由点及面”的帝国式扩张主义理念，试图以此挑战“基地”组织创设的网状结构及规则。动荡弧内的各恐怖组织也不再维持对“基地”组织的单一效忠，一些组织选择两边观望，还有一些组织转而“效忠”“伊斯兰国”。至此，恐怖主义动荡弧中出现了“两极”，并呈现出“竞争+无战争”的特点。“竞争”指的是“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围绕“全球圣战”的主导权与正统性问题所展开的论争，进而表现为在战略目标、行动策略、争夺“效忠者”等方面的博弈。“无战争”指双方除了口头的相互指责外，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与对抗。在动荡弧的两极格局中，相对立的两派恐怖组织杂糅共存，甚至在一个组织内部，也都分化出亲“基地”派和亲“伊斯兰国”派，致使动荡弧出现了网状结构与帝国结构杂糅拼合的特征。这在非洲表现得最为明显。“博科圣地”效忠“伊斯兰国”后，成为“伊斯兰国”的“西非省”；但“博科圣地”内部亲“基地”派仍效忠“基地”组织，并作为“基地”组织网状结构中的一个“点”而存在。^③

“伊斯兰国”崛起策略本身就有其内在缺陷：建立哈里发国家、为动荡弧

① Angel Rabasa, Peter Chalk, Kim Cragin, Sara A. Daly, Heather S. Gregg, Theodore W. Karasik, Kevin A. O'Brien and William Rosenau, *Beyond al-Qaeda: Part 1,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6, p. xxii.

② Daniel Byman, *Al Qaeda, The Islamic State, and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68-169.

③ Jacob Zenn, "Boko Haram's Conquest for the Caliphate: How Al Qaeda Helped Islamic State Acquire Territor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41, No. 3, 2018, pp. 1-24.

内其他行为体提供实体化认同纵然可以提高组织影响力并吸引盟友，但该策略也将要应对“建国”的艰巨挑战及其失败可能带来的崩盘风险，对外则要承受国际社会更具针对性的打击。^① 2017年以来，“伊斯兰国”的人员、资金、领土都被严重削弱；同年11月21日，伊朗总统鲁哈尼甚至宣称已将“伊斯兰国”彻底消灭。尽管未来“伊斯兰国”可能会“化整为零”，在其他地区实现分化重组，但它所践行的“哈里发国家”模式显然在适应性上不如“基地”组织长期以来致力构建的网状结构。未来“伊斯兰国”即使存活下来，也丧失了作为“极”的资格。“基地”组织则保持了“单极”的地位，并继续维系着以它为中心的网状结构。不过，与2014年以前的单极格局相比，新时期的单极格局有所不同：首先，“基地”组织的权威有所下降。虽然“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打击下不断被削弱，但其鼎盛时期的战略诉求、行动策略仍将具有吸引力，“基地”组织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伊斯兰国”释放出的破坏性影响力。其次，动荡弧单极格局内的地区权力分配出现新变化。受“伊斯兰国”渗透与势力转移的影响，原有的一些区域性恐怖组织也主张割据建国，同时某些原本陷入沉寂的恐怖组织再度被激活，甚至还滋生出了一些新的恐怖组织，这些现象在马来群岛诸国、非洲萨赫勒地区表现的最突出。^② 它们与“基地”组织的关系更加不稳定，加之它们对地区内恐怖势力格局的冲击，都显著影响了2017年以来新的单极格局。

第二，从体系机制上看，尽管缺乏明确的法律、条约规定，但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已出现了机制性因素。巴里·布赞（Barry Buzan）曾提出基于共同实践基础上的“基本制度”，^③ 这些制度没有明文规定，但因长期的互动而使动荡弧体系内的各单元都会遵循这些“无形的”规则，并形成恐怖主义动荡弧的机制特征。

其一是要素自由流动机制。全球化过程使得各类行为体创造、延伸并加强了彼此的相互依存度和交流，恐怖组织在全球化时代也具有了全球化的特

^① 刘乐：《“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2期，第32页。

^② Jasminder Singh, *The 2017 Marawi Attack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Security*, Singapore: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une 15, 2017, pp. 1-3; Jason Warner, “Sub-Saharan Africa’s Three ‘New’ Islamic State Affiliates”, *CTC Sentinel*, Vol. 10, No. 1, 2017, p. 30.

^③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80.

点。由于不受“主权”“领土”“边界”等要素的制约，加之恐怖组织分化重组频繁、招募机制较为开放、活动范围较不确定，以及许多恐怖组织间存在的“嵌套”关系与彼此间模糊的边界，因此在恐怖主义动荡弧内部各单元间，要素的流动更为自由。

一方面，人员要素自由流动。上述因素降低了人员流动的成本，使承受巨大反恐压力的恐怖分子有了更大的生存弹性。他们通过增加流动性以模糊、隐蔽身份，从而导致恐怖组织的成员构成快速变化。而随着人员流动过程中地域、族群乃至教派属性的淡化，恐怖分子日益职业化，恐怖袭击逐渐从手段变成了目标本身，所在组织变成一个单纯的栖身之所。^①对很多外籍恐怖分子而言，待遇变成其考量的首要因素，“博科圣地”一度就因其较好的待遇而招揽了众多外籍成员。因而，某个恐怖分子可能今天是“基地”组织成员，明天就变成“博科圣地”成员，也可能同时兼具两个组织成员的身份。具体而言，人员要素自由流动的表现：一是身份伪造机制。恐怖分子在长距离流动中都会获得新的身份，新身份及国家出入境管理机关内潜伏的恐怖组织成员均为其顺利出入境提供便利。二是偷渡机制。另一方面，物资要素自由流动。恐怖组织利用现有金融机制及其他汇款体系，实现资金流动、转移。例如，尼日利亚政府在对联邦银行（Unity Bank Plc.）突击检查的过程中就发现，部分银行职员已被“博科圣地”吸纳，并为后者提供资金流通服务。^②此外，随着人员流动，一些物资也会伴随恐怖分子的行动而转移，例如跨撒哈拉的毒品、武器走私甚至奴隶买卖。

其二是内在奖惩机制。奖惩机制是恐怖组织动员其成员从事恐怖活动的关键。随着动荡弧体系的成型，恐怖组织的内在奖惩机制开始逐渐趋同并形成一定的规则。具体而言，动荡弧体系的内在奖励机制可以划分为物质激励（Material Incentive）、团结激励（Solidary Incentive）和目的激励（Purposive Incentives）3 种类型。^③其中，物质激励指恐怖分子通过加入组织、执行任务所得到的物质回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就指出，恐怖组织

^① Xavier Raufer, “Al Qaeda: A Different Diagnosi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6, No. 6, 2003, p. 393.

^② Lucky E. Asuelime and Ojochemi J. David, *Boko Haram: The Socio - Economic Drivers*, New York: Springer, 2015, p. 78.

^③ Peter B. Clark and James Q. Wilson, “Incentives System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6, No. 2, 1961, pp. 134 - 136.

会利用丰厚的现金开展招募活动，用金钱刺激吸引人员加入。^① 例如“博科圣地”曾在尼日尔出价 50 万奈拉（约合 3 000 美元）招募新成员，并以更高的薪酬奖励来刺激新成员勇于实施恐怖袭击。^② 团结激励是指一种无形的精神鼓励。恐怖组织的成员往往是为获得承认而进行活动，他们渴望获得一种集体身份、荣誉和尊严；^③ 因而，团结激励就是恐怖组织给予加入者的身份认同、归属感、尊重感和荣誉感。“基地”组织就曾对“《查理周刊》袭击案”的制造者表示赞赏，将其誉为“伊斯兰英雄”。目的激励是指在物质激励与团结激励之上更高层次的、对共同理想的建构与宣传，诸如建立超越国界、族群边界的“乌玛”。恐怖组织往往会蛊惑其成员为了所谓的理想事业“殉道”，死后会在天堂获得无上权威、无尽财富。^④ 例如，“基地”组织曾向其成员渲染“殉道”后在天堂衣食无忧的生活。

与奖励机制相对应的是一系列惩罚机制，主要包括：去除身份合法性、“出卖”、肉体消灭。其中，去除合法性主要指将某人从恐怖组织中清除出去，或通过宣言、公示的方式剥夺其“圣战”资格，从而通过去除“合法性”的方式孤立其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就曾谴责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Mokhtar Belmokhtar）违背指令、缺席会议、发表对组织的负面言论，并将后者开除出去。^⑤ 反恐压力始终是恐怖组织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却也成为恐怖组织用来“对冲”内部“异见”压力的方式。一些成员的理念与恐怖组织主导者存在差异，后者若直接实施惩罚可能会引发消极的内部连锁反应，因而将其“出卖”就成为一种惩罚性手段。“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前领导人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

^① FATF, *Financing of Recruitment for Terrorist Purposes*, Paris: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January 2018, p. 21.

^② “Boko Haram Pays N500000 to Niger Recruits – Gang Members”, *Vanguard*, April 24, 2014, <https://www.vanguardngr.com/2014/04/boko-haram-pays-n500000-niger-recruits-gang-members>, 2018-06-18; ICG, *Cameroon: Confronting Boko Haram*, Brussel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November 2016, p. 14.

^③ 曾向红：《为何而战？为谁二战？——恐怖主义、暴力与承认斗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2期，第21~48页。

^④ Assaf Moghadam, “Motives for Martyrdom: Al-Qaida, Salafi Jihad, and the Spread of Suicide Attac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3, 2008, pp. 51-52.

^⑤ Damien McElroy, “Al-Qaeda’s Scathing Letter to Troublesome Employee Mokhtar Belmokhtar Reveals Inner Workings of Terrorist”, *The Telegraph*, May 29, 201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l-qaeda/10085716/Al-Qaeda-s-scathing-letter-to-troublesome-employee-Mokhtar-Belmokhtar-reveals-inner-workings-of-terrorist-group.html>, 2018-03-14.

妻子就坚信，扎卡维由于战略理念与“基地”组织高层分歧严重，自行其是，导致后者向美国出卖了扎卡维的营地位置、出行规律等情报，最终扎卡维死于美国空袭。^①而对于严重背叛组织的成员，恐怖组织往往会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以起到惩戒和震慑的作用。例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2015年就曾以公开行刑的方式处死两名为法国提供情报的成员。^②

第三，从体系文化上看，恐怖主义动荡弧形成了一套将外部信息扭曲化处理并加以自我形塑的封闭性文化场域。虽然存在于同一个世界之中，但各类恐怖单元应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体。^③从体系的视角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恐怖主义动荡弧不仅仅否定了民族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观念，而且还构筑起自身独特的文化边界。其中的伊斯兰政治共同体观念将“乌玛”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原型，消解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合理性；而其中的伊斯兰真主主权观念以“认主独一”为基础，致力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否定了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主权观念。^④

在这种体系文化中，绝对对立的观念被阐发与宣扬，即对“叛教者”与“异教徒”的零容忍——“塔克菲尔”（Takirism）。世界被分为“伊斯兰”与“非伊斯兰”，面对“非伊斯兰”的“战争之地”，需要通过“圣战”实现宗教净化，拓展伊斯兰世界的范围。恐怖主义动荡弧的体系文化淡化了“大圣战”（非暴力的言语方式），将“小圣战”（暴力）绝对化为“圣战”本身，强化了对军事、暴力行动的隐喻，将内外的对立绝对化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斗争。这种被偏执化解读的“圣战”也就成为恐怖主义动荡弧文化体系的逻辑起点。^⑤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场域，就会进一步将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人群非人格化。恐怖主义动荡弧的体系文化将“叛教者”与“异教徒”视为有罪

① “Al - Zaraqawi's Wife: Al - Qaida Sold Him Out”, *China Daily*, July 4, 2006,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06-07/04/content_632521.htm, 2018-03-14.

② AFP, “AQIM Islamists Say Killed Two Men For Spying For France”, *Mail Online*, November 27, 2015, <http://www.dailymail.co.uk/wires/afp/article-3336943/AQIM-Islamists-say-killed-two-men-spying-France.html>, 2018-03-14.

③ Herbert Jäer and Lorenz Böllinger, “Thesen zur weiteren Diskussion des Terrorismus”, in Herbert Jäer, Gerhard Schmidtchen and Lieselotte Stüllwold eds., *Lebenslaufanalysen*, Leverkus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1, pp. 232-242.

④ 刘中民：前引文，第9~10页。

⑤ 刘中民、郭强：《伊斯兰哈里发制度：从传统理想到现实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112~113页。

的，他们违背先知，沦为外部世界危害伊斯兰世界的“工具”或“畜生”，对他们的袭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当合法”的。这种体系文化通过宣称敌人的“非人”，从而否定其人类属性，最终消除恐怖行动的道德顾虑。^①

通过上述对外部世界的分类与定性，恐怖主义动荡弧的体系文化就有了对其内部单元进行塑造的所谓合法性依据，即在个人层面的自我形象神圣化与在团体层面的身份再定义。一方面，在个人层面对自我形象的神圣化。外部世界的反恐压力以及加入恐怖组织前的原有认知，与动荡弧体系形成了格格不入的文化氛围，造成了恐怖分子个体的内在紧张感。为了寻求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与意义，恐怖分子个体恐怖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与主流世界的隔离乃至对抗。被外部世界否定得越激烈，就越能积累起自我“英雄化”的资本。^② 在与外部世界的对抗中，以及被外部世界“污名化”的过程中，他们就越会以“圣战者”“解放者”“净化者”等标签来进行反向的内部自我身份塑造，并自认为肩负着打碎外部世界体系、建立“乌玛”的重责大任。另一方面，在团体层面对群体身份的再定义。在自我身份塑造的同时，恐怖组织内成员的身份也获得了新的界定。恐怖分子在行动中同生共死的情感使彼此成为超越普通朋友层面的“兄弟”“战友”，从而形成基于共同经历、共同事业、共同命运的新的身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情感纽带巩固了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提振了成员行动的勇气与决心，^③ 尤其是随着共同体成员的死亡所带来的情感刺激，使得许多恐怖行动带有强烈的复仇性质，其危害也更为巨大。^④ 更重要的是，新的共同体会作为一层介质，向内部成员提供经筛查后的，或重新阐释过的信息。这类信息会固化内部成员的认知模式与过程，内化他们的恐怖身份，最终为他们提供全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使其难以摆脱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掌控。

^① Klaus Wasmun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West German Terrorist”, in Peter H. Merkl ed.,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 Motifs and Motiv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215.

^② Friedhelm Neidhardt, “Soziale Bedingungen Terroristischen Handelns, Das Beispiel der ‘Baader – Meinhof – Gruppe’ (RAF)”, in Wanda von Baeyer – Katte, Dieter Claessens, Hubert Feger and Friedhelm Neidhardt eds., *Gruppenprozesse*, Leverkus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82, p. 357.

^③ Marc Sageman, *Leaderless Jihad: Terror Networks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p. 88.

^④ Anne Speckhard,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Suicide Terrorist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1, No. 11, 2008, p. 1002.

概言之，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自然属性是无政府性，不存在凌驾于各类恐怖组织之上的、能够垄断体系权力的权威；其社会属性为等级性，各类恐怖组织的相对实力决定了它们在动荡弧体系中的地位。在该体系内，各单元的权力分配和战略关系构成其内在格局。从动态演进的视角加以审视，相对于“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两极格局时期而言，在当前的单极时期，“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内的权力更大、所受约束更小。但从现时的视角来看，情况恰好相反。“基地”组织作为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中的“极”，在享有权力的同时必须更多地服从并维护体系内的规则以及体系的稳定，因而与其他等级地位较低的单元相比，所受约束要更大。不过无论约束力的大小，体系都会对其中的单元施加影响，将其长期互动形成的混合习惯、规范等内化，从而形成动荡弧体系的要素流动机制与奖惩机制，并据此为体系内单元提供行动的框架与规则，进而规定了体系内单元的行动限度，并使单元间有了基本的相互行动预期。这样一种体系共识使其内部单元得以共享一个独有的文化场域，并建构了单元观念与行动的逻辑，最终巩固了单元的恐怖属性。

余论：破解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之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围绕国际“反恐”的理论与实践探讨都已非常成熟，对恐怖单元意识形态、组织发展、组织架构及其运作逻辑的研究，也已十分充实。^① 但若从体系视角来审视 20 多年来的“反恐”，我们不难发现它主要是集中于对某个或某几个组织的打击，以及对“独狼”的监控与管制，即集中于单元层面的治理。事实上，针对恐怖单元的打击与治理无论如何完备，也仅触及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一个要素，体系本身并未受到实质性冲击，

^① See Quintan Wiktorowice, *Joining the Cause: Al - Mujahiroun and Radical Islam: Presented at the Roots of Islamic Radicalism Conference*,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 - 5; Andrew H. Kydd and Barbara F. Walter, "The Strategies of 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49 - 80; Jessica Stern, "Mind Over Martyr: How to Deradicalize Islamist Extremists", *Foreign Affairs*, Vol. 89, No. 1, 2010, pp. 95 - 108; Marko Rakic and Dragisa Jurisic, "Wahhabism as a Militant Form of Islam on Europe's Doorstep",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5, No. 9, 2012, pp. 650 - 663; Joshua Kilberg, "A Basic Model Explaining Terrorist Group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5, No. 1, 2012, pp. 813 - 814.

更无从将其打破。因而，当前国际社会以清除营地、据点的“反恐”行动，无法阻止恐怖分子的转移与恐怖组织的分化重组。某一恐怖组织的“灭亡”仅仅只是意味着组织某一发展阶段的终结。而随着恐怖分子的重组，原组织消失后的真空很快又会被新的恐怖组织所填补。对于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而言，“反恐”只是加速了其内部单元的“新陈代谢”，而并未触及其单元产生与消亡的核心机制。

唯有对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进行系统的综合打击，即采用整合性治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破解恐怖主义痼疾。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从内部打破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阎学通认为，体系三要素（行为体、格局、规范）中至少应有两个要素发生改变才会引发体系的质变。^①对恐怖主义而言也是如此，相对于单元，恐怖主义动荡弧的体系格局与规范的质变更容易发生。如前文所述，恐怖主义动荡弧的格局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从单极到两极再到单极的波动，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这种不稳定的格局及规范特征加以有针对性的治理。当前，“伊斯兰国”对“基地”组织的冲击影响仍未完全消除^②，新的单极格局尚在演变中，如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及现有国家边界管控，在恐怖分子新的分化重组尚未完成之际切断动荡弧内的各种联系网络，并着力削弱主要恐怖组织的影响，从而打破动荡弧的体系格局，可能是未来应深入探索的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切断外部世界对动荡弧体系的支持。恐怖主义动荡弧的维系离不开外部世界的各种要素支持。从人员来源角度看，贫困、缺乏关爱、不公正待遇、认同感缺失等都是个人脱离现有社群与体系并加入恐怖组织的原因。^③从物资角度来看，部分教众的捐赠与支持、少数地区收缴到的“天课”、恐怖组织与外部世界的走私联系等，都为动荡弧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撑。^④从意识形态上看，对伊斯兰教的极端化解读乃至曲解，构成了

① 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页。

② “伊斯兰国”溃败后全球反恐形势发展，参见王震：《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第3~26页。

③ UNDP, *Journey to Extremism in Africa: Drivers, Incentives and the Tipping Point for Recruitmen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 p. 4.

④ FAFT, *Terrorist Financing in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Paris: The Financial Action Force, October 2016, p. 16; Patrick Blannin, “Islamic State’s Financing Sources, Methods and Utilisation”,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9, No. 5, 2017, pp. 13–22.

恐怖主义动荡弧的观念支撑^①，而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矛盾使得恐怖组织得以利用教派话语体系为其行动提供宗教合法性。^② 国际社会与相关国家应探索有效协同推进社会治理、经济治理、政治治理、宗教治理的路径，在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调和其宗教观与国家观，从而消除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的外部要素支持，使“动荡弧”向“稳定弧”转变。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恐怖主义动荡弧在地理上、人员物资上乃至思想上的联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有主权国家治理失效的后果。如何提升国家的安全治理能力，恐怕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这是因为，消除恐怖主义动荡弧需要强化各主权国家的边界管理、提升各国政府的合法性与国家治理能力，以此切断其人员、物资的联系，使动荡弧体系“退化”为一个个单独的恐怖组织，进而实现各个击破。如果没有世界各国各自反恐的有效行动，以及彼此间的务实合作，国际社会反恐斗争就难以取得成效。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超越理解恐怖主义的组织视角与观念视角，初步提供一种能解读恐怖主义的体系视角，并以此为出发点，将恐怖主义动荡弧视为并建构为一个体系。作为体系，恐怖主义动荡弧具备了自身的内在格局、机制与文化特征，这些因素共同使动荡弧体系成为恐怖主义单元及其互动演变的自变量。本文呈现这一体系的努力仅是起步，笔者仅试图挖掘一个新视角，搭建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事实上，我们对恐怖主义动荡弧体系内在要素的深入探讨仍不充分，其中对某些环节的逻辑清理仍不完善，尚待加强。无论如何，注重单元及其观念以外的恐怖主义新要素及其新结构，对于深入理解恐怖主义问题是有意义的，也将是恐怖主义研究领域的新增长点。未来，厘清恐怖组织间的具体互动，如人员、资金往来及其方式，不回避从“他者的视角”对其进行合理化解读，并注意各个恐怖组织与恐怖主义动荡弧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才更有可能把握恐怖主义的本质，进而实现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打击与治理。

^① 参见马丽蓉、李景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根源与“去极端化”领域国际合作》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18~40页；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1~61页。

^② 包澄章、刘中民：《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教派主义的多维透视》，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5期，第44页。

Analysis of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Wang Tao & Bao Jiazhe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instability can not only start from organizational and conceptual level, but also from the system level. As a system, the formation of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is based on the uni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These units include glob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regional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and “lone wolves”. Their interaction involve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alliances. The interactive content includes personnel movements, financial flows, and sharing of ideas. The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has a holistic character after its formation, and its core nature is the “feedback” effect. Among them, positive feedback promotes the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and negative feedback ensures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the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is unstable. It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uni – polarity and bipolarit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chanism, despite the lack of laws and treaties, mechanism of the free movement of units and other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l reward and punishment have emer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e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has formed a closed cultural field that distorted external information and shaped itself. Such information will solidify the cognitive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l members, internalizing their terrorist identity, and ultimately making them a solid defender of the system. In response to the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syste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not only take comprehensiv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errorism, but also cut off the support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so as to fundamentally eradicate terrorism.

Key Words: Terrorism Arc of Instability; Units Interactive; System Properties; Integrative Governance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